

證嚴法師這個「領袖」，這個宗教團體的文化和結構的產生、維繫與擴展，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不知作者是否有意避掉這個被台灣社會和社會心理學界已經「談膩」的話題？但避開這個主題，對本研究是有傷害的。「領袖」這個概念在本書中，至少值得有一個專節，乃至於一個專章去處理，否則對慈濟功德會助人行為「脈絡」的掌握是有所缺憾的。

郭文般

台北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方孝謙著，台北：巨流，2001年，200頁，NT\$240（平裝）。

無論戰後到 1980 年代中期仍佔社會優勢的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或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在本地逐漸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它們對於日據時期歷史和當時台灣人民與殖民者的關係，都各有不同的描述與解釋。這些不同的歷史再現，卻共同反映了民族主義對歷史上「我群」成員的集體認同，採取的往往是一種相當「總體化」（totalized）的理解方式，亦即假設人們某種單一的經驗範疇——屬於一個特定的民族——會片面地凌駕、決定他們之間其它差異（譬如階級、性別、世代、職業、地區等）的影響，而成爲這些歷史上我群成員集體行動最重要的動力。

相對於至今爲止上述佔社會優勢的（不同的）民族主義的理解方式，方孝謙博士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就在於告訴讀者，台灣「日據下漢人認同的問題，不應該被簡化爲『民族認同』的問題」（頁 17）。不過作者的討論，並未限於與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相關的集體認同議題，而是較廣泛地分析在面對日本殖民統治

時，台灣漢人「如何看待『我是誰』的問題」（頁17）。作者從「敘事理論」出發，刻意選擇具有濃厚「故事性」的各種史料——亦即作者認為具有「敘事性」的論述，包括遊記、善書、雜誌與報紙的社論、專文、小說、私人日記等（頁20），分析台灣漢人在面對殖民者時，如何回答「我是誰」的問題。運用這些性質相異的史料，也使作者的分析能夠涵蓋不同階層的台灣漢人，避免通常只依賴菁英階層的言論來研究歷史上人群認同問題之缺陷。事實上，對於不同階層的集體認同所倚賴的文化參考架構的差異，以及對未來集體命運的不同思考，正是本書分析的一個重點。綜合本書主要部分的第一到第三章的分析，作者的論點如下：日本殖民主替被殖民者預設的認同典範，與被殖民者不同階層本身的認同典範，有相當大的差距。日本據台最初的二十年左右，支持漢人上下階層的認同基礎，仍然來自固有的、源自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與現代民族認同「沒有關係」。台南西來庵信徒反抗日人的集體行動，也「與現代民族認同，絕無牽涉」（頁69）。再者，1920年代台灣漢人菁英階層的民族認同論述呈現紛雜游移的主體位置與政治立場。殖民地的漢人菁英對於「我是誰」的問題，並沒有全體一致、首尾一貫的解答。因此這些早期的論述，「不足充當〔目前〕台灣獨立建國的依據」（頁183）。到了日據後期，漢人庶民與知識青年各自的認同，呈現兩極化的發展。庶民仍以仇日、仇視一切剝削者的意識與傳統文化資源為認同基礎，而知識青年則做為殖民地現代性的結果而與傳統文化疏離，逐漸認同日本人。作者因此從這兩極對比指出，「我是誰」的困惑要得以紓解，「固有的文化資源是不可或缺的支柱」（頁130）。

作者用心地從敘事理論的角度來說明為什麼可以用遊記、善書、社論、專欄、小說、日記等做為「替代性史料」來研究認同問題（頁70，178），這種正當化研究資料選擇與運用的努力，值得肯定。尤其是從這個理論觀點選擇善書，探索那些通常在「歷史中無聲的一群」平民大眾的自我認同，更有一定的創意。

然而通觀全書，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作者在運用理論上的強烈企

圖，卻往往得不到反映經驗現象的史料之充分回應。因此在似乎宏偉的理論架構與繁複的概念和經驗性的史料兩者之間，有相當的落差。首先，在閱讀各章的理論評述時——包括「緒論」討論認同、敘事、論述（頁 12-17），第一章討論敘事認同、結構主義（頁 33-42），第二章討論借助於後殖民主義研究者的民族認同論述分析座標（頁 90-94），第三章討論 Hayden White 的喻格理論（頁 130-143），恐怕有不少讀者和筆者一樣，很快地就迷失在聚合、組合、論述事件、論述意義、首要指涉、次要指涉、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等眾多相當抽象的概念以及飽含這些概念的連串命題之中。筆者閱讀時經常在前後文反覆對照，然而結果還是如墜霧中，難以脫困而出，因此無法清晰地掌握這些討論。

其次，繁複的理論與有限的史料，呈現明顯的對比。作者在許多地方，也承認這種理論與經驗的落差。譬如在第一章，作者即指出「限於我們的史料，尤其是流傳故事的篇幅短小」（頁 71），因此費心地花了八頁的篇幅建構出來的「敘事認同理論」架構（頁 33-40 與頁 41 的理論摘要圖）無法充分利用。在第二章，除了有關蔣渭水的史料較豐富，因此在分析時尚能運用「民族認同論述分析座標」外，作者也告訴我們，其它台灣漢人菁英的言論史料有限，所以只能做「初步的分析」（頁 94,106）。事實上作者也指出，蔣渭水有關時間面向的民族認同論述很少，因此無法進行與時間有關的座標分析（頁 95,120）。至於在第三章，作者則說明運用四大喻格的理論架構時，「我們不至於把日據小說生硬套入」其中（頁 143）。筆者認為，理論介入現象而做為一種解釋或理解的工具，必須與經驗現象契合。理論的發展與研究者對現象的理解，彼此應當處於一種辯證的狀態，互相發明。當然，就像許多其它的研究者一樣，作者在此援引的概念與理論資源，並非自己所原創。然而作者畢竟費心地對這些理論做一番自己的詮釋與再建構。經過這些努力所呈現的繁複概念與理論架構，因為史料不足，而無法盡其效用，那麼引借、搭建這些理論架構的價值與意義，恐怕要打相當的折扣。由於理論與經驗性史料的落差。筆

者甚至認為，本書在許多地方的討論即使放棄其理論架構，恐怕也可以達到作者論證的結果。事實上，在討論蔡培火、連溫卿、陳逢源、許乃昌、林獻堂、謝春木等人的言論時（頁 108 下至頁 120 上半），作者即不曾運用「民族認同論述分析座標」的兩軸架構來分析。然而閱讀這約佔第二章四分之一篇幅的討論，筆者認為，放棄作者費心搭建的理論架構，也無損於論證的發展。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討論漢人小說反映的庶民認同（頁 146-153）與知識青年認同（頁 155-167）時。在第三章的這兩個主要部分的分析上，除了在各部分小結時以四大喻格理論架構中的幾個概念範疇將小說分類之外，在實際討論過程中，四大喻格的理論架構可以說沒有發揮的餘地。姑且不論作者所鋪陳的理論架構有許多不夠清晰的概念與命題，即使這些理論工具或許可以運用於其它歷史個案，然而接續而來的其他研究者要將它們同樣運用於日據時代類似課題的研究，恐怕也難以為繼。綜合而言，就作者企圖運用於日據時代認同研究之初衷而言，這些理論的效用與意義，恐怕值得商榷。

另外，作者再三致意的是他在第二章的研究，深受 Benedict Anderson 最近台灣之行所發表談話的啟發。然而作者從後殖民主義觀點批評 Anderson 的理論時，恐怕混淆了 Anderson 在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的問題意識。Anderson 這本書主要分析的是：現代民族主義理解世界之方式（對政治社群的「想像」方式）——將民族視為內在地具有界線與主權的政治社群——的性質，及其在歷史上的起源、傳布、與影響。做為一位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Anderson 並未在書中明示或暗示他接受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然而作者引用他人的研究，認為「Anderson 想像的民族認同乃是嶄新的現代意識的產物……，而這一身分又被他想像為乃同質的『大我』」（頁 82）。作者因此批評 Anderson 忽略歷史上被壓抑的聲音與曖昧游移的主體位置所反映的異質認同（頁 85，91）。然而這恐怕將 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描述分析，不恰當地等同於其規範主張，同時沒有注意到所借用的後殖民主義者的批評，或許也有混淆 Anderson 的問題意識的可能。

正因為上述的混淆，作者因此將對民族認同性質的「現代主義式」與「後殖民主義式」的看法，不恰當地對立起來。就後者而言，作者引用 Stuart Hall 所說的，「認同」是「我們在遭到各種歷史敘事（narratives）的定位及反過來自我定位之後，對這些位置的命名」。作者於是進一步指出，「認同只是標籤，其『實質』來自歷史及『我們』為定位而形成的論述鬥爭。……民族認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一群人……想像如何以一政治上的集體範疇——『國家』（nation）——稱呼『我們』所用到的各種腳本，或者論述」（頁 82）。然而單就這一點來說，它和作者稱為「現代主義式的」Anderson 理解現代民族認同的取向，恐怕沒有太大的差別。*Imagined Communities* 的最後一章向我們顯示的，正是在特定歷史社會的權力形構中，記憶與遺忘如何地交錯而浮現特定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認同。至於通常也和 Anderson 一起，被視為民族主義研究的現代主義者代表之一的 Eric J. Hobsbawm，則以「傳統的發明」的概念來分析民族主義者對特定歷史敘事與主體位置的建構。這些都是許多研究者耳熟能詳的論點。

最後，筆者要指出的是：作者對於 1920 年代台灣漢人菁英階層的民族認同論述呈現紛雜游移的主體位置與政治立場，分析得相當清楚。而基於分析的結果，作者致力於指出：「日據下發生的『殖民地民族主義』並不影響目前勃興的所謂『歐裔民族主義』」（頁 121）；這些早期的論述，「不足充當〔目前〕台灣獨立建國的依據」（頁 183）。然而所謂的「並不影響」與「不足充當」，對當代的民族主義者本身而言，恐怕未必如此。民族主義做為認同論述的一個特質，就在於展現在其歷史敘事的高度創意與雄辯，甚至發明傳統。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永遠不乏歷史材料來正當化眼前的行動。渺遠的時代與曖昧的過去，民族主義者自能發揮創意與雄辯，將它們與當代聯繫起來。對他們而言，那就是影響。因此影響與否、足不足以充當之類的問題，民族主義者恐怕自有一番說解。我想作者真正的意思應該是：從日據時期至今，台灣民族主義並非一必然而連續的發展過程；如果日據時期的民族論述與當今的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一同質而直接聯繫

的傳統，恐怕是「發明的傳統」。

作者的當代社會關懷因此很鮮明。在「緒論」中，作者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對於目前言人人殊的認同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台灣過去被日本統治的經驗……得到歷史教訓」（頁11）。然而除了上述本書關於日據時期民族認同議題的主要論點之外，當我們隨著作者的討論進展來到全書的「結論」時，作者仍然沒有具體表明這個一開始就向我們允諾的歷史教訓。也許作者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會向歷經本地民族主義政治的紛紛擾擾的我們，更顯豁地開示這個歷史教訓吧！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張晉芬著，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263頁，NT\$300（平裝）。

從1980年代之後，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所謂的全球化時期，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思潮、口號與政策儼然成爲世界主要潮流。市場似乎被認爲是一切問題的萬靈丹，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等也被各國普遍視爲主要的政策推動方向。然而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風暴，以及最近一年多以來的全球性不景氣，震撼了大眾對於全球化將會帶來普世繁榮的想像。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反省，不論是理論或是經驗研究，都是一個急需從事的課題。而在台灣學界，雖然私有化的問題已經成爲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討論議題，但是國內除了經濟學領域大力鼓吹之外，卻鮮有理論反省性的著作。在此時刻，《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的出版因此格外具有意義。它應該也是第一本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台灣近年來私有化進行比較全面性的經驗研究，提供了經濟學之外另類批判性的反省和看法。